

须做好应对长期通胀的打算

受翘尾因素和输入型通胀因素的影响,未来几个月我国物价上涨的压力还在继续加大,通胀形势严峻。美元贬值、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以及中东地区部分产油国局势动荡推高原油价格等因素,都将长期给我国带来较大的输入型通胀压力。从影响物价的长期因素来看,本轮通胀可能呈现长期化的趋势。因此,调控政策要做好应对长期通胀的打算。

边缘宝

稳定物价成为今年两会关注的焦点问题,种种迹象表明,通胀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因此,宏观调控政策必须做好应对长期通胀的打算,万不可因为某些经济数据的回落而提前放松。

近期物价有继续上升势头

从当前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走势来看,今年2月份同比上涨4.9%,与上月基本持平;受春节消费因素的影响,2月份环比上升了1.2个百分点,是2008年2月以来月环比最高涨幅,食品依然是推动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未来随着节日消费因素的消失和天气的逐步转暖,以农产品为代表的食品价格将会出现明显的回落。

尽管如此,受翘尾因素和输入型通胀因素的影响,未来几个月我国物价上涨的压力还在继续加大,通胀形势严峻。预计从3月份到今年8月末,多数月份的CPI将会超过5%,个别月份可能会超过6%。预计3月份的CPI同比

上涨约为5.3%,将再创两年来新高。

笔者认为,近期推动CPI继续上涨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翘尾因素将继续拉升CPI。未来6个月,多数月份的CPI翘尾因素超过3个百分点,仅此一项将推动近期CPI居高不下。其次,以劳动力成本、住房租金为代表的非食品价格继续上涨。再次,从外部因素来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仍在继续上涨,输入型通胀的压力有增无减。2月份的国际食品价格再创历史新高,国际原油价格仍处于高位,考虑到日本的灾后重建和北非的动荡,原油价格将持续上涨。美元的不断贬值也将进一步推高大宗商品的价格。

先行指数预示通胀长期化

今年以来反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CRB指数基本上呈一路上涨走势并创出两年多新高;而国内采购经理指数(PMI)中的购进价格指数也一直居高不下,2月份的购进价格指数、主要能源原材料、中间品和生产用制成品购进价格指数均超过70%,部分行业更是超过80%。CRB指数和购进价格指数

长期居高不下表明,今年我国面临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将远远大于以往任何时期。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原材料进口国,美国长期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美元贬值,全球经济复苏步伐加快带来的大宗商品价格普遍上涨,以及中东地区部分产油国局势动荡推高原油价格等因素,都将长期给我国带来较大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并继而强化成本推动型的通胀。

研究表明,最近几年来,我国的能源与原材料价格向主要工业产品领域,工业产品向一般消费品领域传导的时间和范围在逐步扩大。当前的通胀也不再仅仅是猪肉、蔬菜等主要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是表现为食品类与非食品类,居住类与服务类价格齐涨的态势,推动通胀上升的因素也已经由前几年的由于异常天气导致的粮食、蔬菜等主要农产品减产转变为原材料、土地、劳动力等基本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因此,从影响CPI的长期因素来看,随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上涨,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以及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我国本轮通胀可能呈现长期化的趋势。

做好应对长期通胀的打算

稳定价格总水平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笔者认为,当前我国通胀形成的原因复杂,既有前期货币超发导致的流动性过剩因素,也有成本推动和国际输入因素。因此,治理手段不能仅仅依赖于货币政策,需要财税政策的积极配合。

第一,合理搭配数量型工具和价格

型工具加快回收流动性。为了回收流动性,治理通胀,央行已经使用了包括加息、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差别化准备金率、新增信贷控制、窗口指导等在内的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目前我国大型商业

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上调至20%的历史最高水平。为了抑制通胀,央行今后可能继续加息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周小川在两会的记者会上明确表示,抗通胀要运用所有货币政策工具;而在当前来讲,利率政策还是一个重点需要使用的工具。我们认为,随着3月份CPI的继续走高,央行在4月中旬可能再次加息。

第二,适度压缩政府投资规模。今年是我国“十二五”开局之年,从公开的报道来看,各地都准备了一大批建设项目,

只等国家审批通过后,一场新的经济增长竞赛又将开启。过去的两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我国新增财政性政府投资4万亿美元,并由此导致新增银行信贷规模数倍的扩张,两年新增人民币贷款约17万亿元;这也就是说,政府和国有企业每新增1元的投资,银行就相应地新增约4元的信贷;通过投资的杠杆效应,政府和国有公司的投资活动能够以较少的自有资本从商业银行贷出更多的款,这也是我国流动性泛滥的重要源头。因此,为了抑制通胀,今后必须适度压缩政府投资规模,有效减少货币扩张。

第三,实施结构性减税,充分发挥财税政策的调节功能。管理通胀除了要适度紧缩货币,压缩政府投资外,财政政策还应该通过减税和降低税率来切实减轻企业和民众的纳税负担,从而增强社会公众的消费实力。特别是对于抑制当前的成本推动型通胀,通过结构性减税措施,比如降低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企业的税负水平,取消某些不合理的税种,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等,可以立竿见影地降低企业和民众的生产和消费成本,从而提高抗通胀能力,也有助于平衡货币紧缩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作者系齐鲁证券高级宏观分析师)

焦点评论



楼市调控又放话:一套房子一标价。新政出自发改委,本意打击投机家。明码标价能监督,暗箱操作难觉察。房子要以住为本,泡沫不挤危害大。

朱慧卿/画
孙勇/诗

召回问题轮胎需制度驱动

王旭东

锦湖轮胎质量问题经3·15曝光之后引发关注。其中国区总裁李汉燮在央视节目中鞠躬道歉,表示将在最短时间内召回问题轮胎,成为国内首例轮胎召回事件。有专家称,锦湖轮胎召回有利于填补相关制度空白。

召回制度,我们并不陌生。但就国内外对比来讲,国内显然尚未“与国际接轨”。有资料显示:发达国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建立起完善的召回体系,与之相比,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严重滞后。2004年,我国才出台第一个《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此后,随着一些群体安全事件的爆发,又相继出台了《药品召回管理办法》、《儿童玩具召回管理规定》和《食品安全法》中建立的食品召回制度。于是,就出现很多问题商品“仅在国外召回”,在中国却可以“安身”。

召回问题轮胎,能否“驱动”相关制度?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专家表示,锦湖轮胎的召回开了国内零部件厂家召回的先河,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件好事,因为以前召回都是针对整车企业,由于轮胎会使用在很多车型上面,这样就比较复杂,此次召回有利于相关制度的制定。这也许仅是一家之言,也许只是一个预期或愿景。眼下,缺陷产品召回的范围很“骨感”,而缺陷产品却很

“丰满”。制度的空白、法律的空白让很多缺陷产品有生存空间。

产品召回应该法制化。有观点认为,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多头监管协调难度大等原因则进一步加大了召回的难度。首先,无法可依成为召回的重大难点,除了汽车、药品、儿童玩具和食品以外,其他领域的产品召回,在中国尚无法可依。其次,由于侵权责任法以及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的不完善,大大降低了召回的可能性。此外,多部门协管增加了执法的难度。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法律与制度问题。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法治不健全,市场经济就会变形;法律不强制,缺陷产品就会“缺憾”。

召回问题轮胎,更需制度驱动和法律驱动。有专业人士认为,完善的经济立法是建立“产品召回制度”的前提。因为依法规范厂商的经营行为,依法检测认定产品,依法强制厂商召回问题产品是产品召回制度的基本运作方式。综观实施产品召回制度的国家,无一例外都是经济立法高度完善的国家。因此,有人提出,我国应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召回法》,并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法规。制度建设和法制健全要“多轮驱动”,加大马力。

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蕴含深意

陈和午

国家发改委3月16日发布《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简称《规定》),专门对商品房销售的明码标价问题作出规定,要求:商品房销售要实行一套一标价,并明确公示代收代办收费和物业服务收费,商品房经营者不得在标价之外加收任何未标明的费用。《规定》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

国家对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的要求其实并不新鲜,在此前的楼市调控政策中就屡有涉及。例如去年1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办发[2010]4号)和去年4月份《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国发[2010]10号)中都明确要求商品房明码标价对外销售。不过,在实际中这些规定的效果并不理想,每次都是干打雷不下雨,房子一天一个价全凭一张嘴。

情况仍是屡见不鲜。

此次发改委老调重弹又是何意呢?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是否意味着在限购的基础上对商品房价格来一个限价的紧箍咒呢?其对抑制房价上涨究竟又能产生多大的效应呢?在笔者看来,此次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再次走到前台,对商品房如何实行明码标价,价格该怎样标等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说法,应该说是有利于维护和规范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正常秩序的,也是对调控高房价的一次有力配合,但政策效应的发挥关键还在于实际执行中的具体操作情况,否则就又会只是一个空头支票。

首先,商品房明码标价将让房价这一开发商的“最高机密”不得不多少向市场公布出来。《规定》中指出,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应当做到价目齐全,标价内容真实明確、字迹清晰、标示醒目,并标示价格主管部门投诉举报电话。显然,此前的政策文件虽

然屡次提及“明码标价”,但具体如何做一直是比较模糊的,此次《规定》进行了细化,并明确了价格监管部门,这是有利于抑制楼市一些不规范价格行为的。

其次,商品房明码标价有让楼市调控从限购向限价转移之趋势。今年1月26日国务院公布了“国八条”,开启了第三轮房地产市场调控大幕,不少地方楼市限购令也是纷纷出炉,当前正是两会结束之后楼市调控的关键时期,中央要求各地在一季度末出台房价控制目标,尽管住房市场双轨格局运行的态势基本形成,但由于关乎着土地制度和财税体制,短期内能不能把高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控制住实在不乐观。限购措施打压了楼市成交量,“明码标价”则会让房价逐步透明起来,政策若真能落实,可能无形之中会起到限价之效。虽然有担忧称开发商开盘之前可以先提高一点价格,但在货币政策趋

紧和楼市调控难松绑的态势下,现金为王才是上策,逆势提价承受的资金压力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第三,商品房明码标价的执行力再次考验楼市政策效应。现在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开发商,在多年与中央楼市调控的一轮轮博弈中,都学会了如何来面对或规避新政策的作用,此次同样也不会例外。毕竟,虽说中国经济转型早已吹响了冲锋号,但目前经济过度依赖房地产的事实却一时半会难以改变,一些地方经济增长中有50%到60%是来自于房地产的。两会期间,多地市委书记就谈到土地出让金的问题时,都纷纷发出“不卖地根本无法保民生”之抱怨。“明码标价”的实际操作最终要落实到地方政府头上,各地会否再次使之遭遇不无忧虑。在执行过程中永远会出现问题现在已是大概率事件,此次政策是否又一次上演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政策免疫”的局面呢?这将是对楼市政策执行力的重大考验。

■ 专家论道 | In-depth Comment |

密切关注中国经济的外部风险

世界工厂的角色只是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一种路径安排。中国必须突破美欧设在金融领域的壁垒,力争在高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而在“资源为王”时代,中国既要进入被国际大投行控制的期货市场体系,更要密切关注西方主要大国对中国获取外部资源通路的控制。

章玉贵

西方打击利比亚别有用心

从上周六开始,法国、英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禁飞区决议,从空中和海上对利比亚的军事目标发起了军事打击。全球影响力极大的英国《金融时报》专门为此发表《打击卡扎菲的正当性》的社论,凸显西方舆论为国家或者国家利益集团服务的忠实性和及时性。

站在西方的立场上,打击卡扎菲政权的确有很多理由。笔者只想提醒的一点是:战争背后的经济逻辑特别值得我们深思。12年前,美国巧妙地发动了科索沃战争,在收拾了不听话的“异类”一米洛舍维奇的同时,也通过点燃欧洲火药桶,给刚刚出炉的欧元当头一棒;12年后,当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越日本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并且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合作有了比较好的态势时候,战争又来了。

西方视中国为竞争对手

在西方主要大国看来,中国已经具备了成为其竞争对手的基本要素:经济规模直逼美国,贸易地位不断上升,金融力量今非昔比,全球影响力与日俱增。尤其经过这场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冲击,西方的金融贸易力量遭到削弱,而从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来看,经济总量比肩美国只是时间问题。

中国在经济规模上的快速增长并不能掩盖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实质差距。事实上,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逻辑框架下,已嵌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环节的中国经济,业已成为跨国公司全球产业和资本流动的一部分。例如,中国去年将近6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中至少有四分之一是由外资企业创造的。对于经济总量超越我国台湾地区、逼近韩国的我国广东省来说,优化的经济结构和普遍的幸福感,才是下一步应当追求的目标。国人更应看到的是:美欧设在金融领域的壁垒以及日美在高端产业领域相对中国的大优势,都是中国短期内难以逾越的瓶颈。

一向特别重视趋势的西方国家最不能容忍的是不遵守它制定的或不和它玩同一游戏规则的国家和势力。他们的战略是:在中国经济还不十分强大之前,利用他们操控的国际经济秩序对中国施加各种压力和干扰,以图削弱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之势,尽可能地维持现有的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国际经济格局,或者利用现有的规则尽可能地压缩中国的上升空间。

警惕战略机遇期的中断

目前是中国建国以来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同时大概也是外部环境变化情势最敏感或者说外部风险正在累积的微妙时期。在享尽了既有秩序框架太多好处的主要发达国家看来,与其并不在同一战壕里的中国近年来在经济上的迅速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话语权诉求

求,尽管是难以阻遏的历史趋势,却总有一种如芒在背的感觉。

假如我们把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以来到目前这段时期作为考察中国国际经济地位变迁的时间光谱,会发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大国正从有求于中国,向赋予中国一定的国际空间,到运用综合力量工具来防范中国成为国际政经秩序变革的积极主导力量这个策略演变。换句话说,中国利用西方发达国家金融力量衰弱的有利时机以显著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时间光谱已成过去。如果一定要列出本轮金融与经济危机发生以来中国从既有国际秩序框架中获取的话语权菜单,我们会发现其实并不多。例如,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中的发言权的些许扩大,只是美国在保持自身否决权的情况下,力压欧洲和日本让渡一部分权力的结果。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的治理结构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至于备受期待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也大体如此,美国人可以指责小布什的穷兵黩武和在国家经济治理上的不思进取,但一定不会怀疑其在美元最为困难时期为了保持其主导地位而付出的相关努力。至于打着变革旗号上台的奥巴马政府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一点也不比前任软弱。

所有中国金融从业者都不容忽视的风险是,早已把转嫁经济风险招术玩得纯熟的美国,是不会放弃利用中国的经济与金融漏洞来遏制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来看,经济总量比肩美国只是时间问题。

沉寂了100多年的中国再次成为世界主要经济力量并非什么奢望。从资源禀赋的角度来看,中国并不缺少成为顶尖经济强国的基本要素,亦不欠缺要素禀赋结构改善和制度创新的内生性动力。但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将很难拥有西方经济强国崛起过程中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因此,在成为世界级强国之前,中国必须高度警惕国际资本及其代言人的经济渗透和战略围堵。

力争在高端产业实现跨越

笔者认为,世界工厂的角色只是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一种路径安排。中国必须突破美欧设在金融领域的壁垒,力争在高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也许,中国企业要从老辣且极易结成价格同盟的上游供应商以及国际投行那儿最终博得定价主导权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但在“资源为王”时代,缺失初级产品定价权的中国既要运用国际通行规则与上游企业展开多回合的博弈,也要打进被国际大投行控制的期货市场体系;并在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同时,尽快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益的经济发展模式,早日形成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方式。

同时,更要密切关注西方主要大国对中国获取外部资源通路的控制。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申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电邮至pp118@126.com。